

呼喚文藝復興

收錄於《自由與文學》，聯經

高行健

這全球化的當今時代，政治和廣告無孔不入，連文化也充分市場化，文學和藝術如果不退化為一種文化消費，還保持精神的獨立和創作的充分自由是否可能？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這也並非是一個新鮮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不過是二十世紀的延續。因此不得不對二十世紀先做個回顧，看看這問題的根由何在。

人類歷史上政治權力對文學藝術的干預不是沒有先例，但從來還沒有像二十世紀那樣，眾多的作家藝術家心甘情願把文學藝術創作作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和武器。這不僅是政治權力令作家藝術家不得不就範，為之服務，而是特定的意識形態在左右作家和藝術家，較之宗教信仰有過之而不及，甚至鬧到狂熱的地步。誠然，這種意識形態以革命的名義製造的烏托邦幻影往往令人喪失良知和正常的事理判斷，鬧了大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就這樣破產了，連同為之服務的文藝，如今已無人問津。但其後的這種泛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未就此終結，依然在影響當今的文學和藝術創作，所謂介入，也即介入政治，或解讀為就範於某種政治正確，仍然時不時左右當今東西方的文壇。

問題進而又在於現今世界離開了政黨政治，還有沒有作家藝術家個人能掌控的政治？而作家藝術家如果不納入一定的政黨政治，還有無可能以其創作來改變社會或左右政局？可憐的孤單的作家藝術家還有無別樣的選擇？

以人權為標榜的自由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現實世界中個人的自由總受到政治和社會條件種種制約，更別說集權政治制度下的壓迫，這也是人類至今尚擺脫不了的生存困境。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如果不從現實的功利中解脫出來，也還是一番政治正確而義正嚴辭的空話。作家藝術家如果不甘心充當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的點綴，真正贏得創作自由，不能不回到文學藝術的獨立自主，既不服務於政治，也不謀求現實的功利，從而返回文學藝術的初衷，也即在純粹的精神領域裡，表述人的認知，面對人生存的種種困境，深深觸及人性的幽深與複雜，從而留下充分而生動的見證。

然而，市場法則全球化鋪天蓋地的現今世界，這樣非功利的文學與藝術又何以立足？這才是要討論的真問題。資本牟利的機制導致的商品化，遍及一切領域，同樣也包括文化，這鐵定的機制訴諸非是與倫理的判斷無濟於事，恐怕只有立法才能有所制約。但如何建立這樣的法制來保障這種非功利的文學藝術創作？也還只能是一紙空談，這便是現今作家藝術家面臨的真實的困境。

超越政治和市場不謀求功利的文學藝術在現今這時代是否可能？而這樣的文藝並不回避現時代人的生存困境，作家藝術家毫無禁忌，直面人生，獨立思考，並訴諸充分自由的表訴，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文藝。

這樣的文藝首先得出於作家藝術家自身的感受，全然來自個人獨立不移的思考，不吐不快。其實，這也正是文學藝術的初衷。這樣的文藝也是人的意識的結晶，人類生存和人性的見證。而文學藝術的歷史正是由這樣的作家藝術家和他們留下的作品積澱而成，從而成為人類文化可以傳承的精神遺產，而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具有認知的價值，經久不衰。現今的作家藝術家敢不敢接受這樣的挑戰，這也正是作家藝術家們當今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

這樣的作品自然超越時尚，毫不理會權力和媒體倡導的流行趣味，而且無所謂現代與當代乃至古典的分野。作家藝術家相反得解脫種種用於辨認的時尚標籤，也不去投新聞媒體所好。從事這種創作的作家藝術家當然首先得沉住氣，靜下心來，潛心投入，不計成果，只在意是否盡心達到盡可能充分的表述。

這種作品的價值更在於是否深刻觸及人的生存條件及其困境，又如何展示人世的複雜和人性的幽深。真實與否才是最終的價值判斷。

這裡講的真實而非新聞的實錄或歷史的紀實；這裡講的真實是經過藝術再創作昇華了的人生經驗；這裡講的真實包含作家藝術家的虛構與想像，通過審美而得以展示的人世的眾生相；這裡講的真實較之日常現實的表像更醒人耳目，觸目驚心而發人心智，揭示的恰恰是人性人生人世的底蘊。而這真實又無法窮盡，總也可以達到更深入更透徹的表述，就看作家藝術家的功力如何了。

這種創作當然無須他人的指令，更沒有現成的模式，首先出於作家藝術家內心的衝動和對人世的洞察，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與淬煉，找到恰當的表述方法和相應的藝術形式。即使有前人的作品作為參照，也還得通過作者自身的認知與才能，打上個人獨特的印記。

這樣的作品並非是民族和時代必然的產物，而是一個個獨特的個案。歷史上有的是文學藝術暗啞的國家和時代，只有帝王和政權更替的編年史，卻不見發人深省經久可看的作品。文學藝術也不遵循進化論的規律，後人未必比前人高明。歷史主義解釋不了文學藝術的這種偶然性。這種偶然恰恰來自作家藝術家個人的洞察力和才智，關鍵在於作家藝術家本人的認知是否如此敏銳而清醒。

這裡談的既然是創作，與其討論時代提供的社會條件，不如回到作家藝術家自己的認知。換句話說，重要的是作家藝術家本人的覺悟，一旦覺醒到創作的自由從來也不是誰能賜予的，便自尋出路。因而，只要還有人身行動的自由，衣食溫飽有基本的保障，哪怕是中世紀身在逃亡的但丁和大興文字獄的滿清帝國隱匿身世的曹雪芹，都留下了不朽之作。

相比之下，當今的作家藝術家畢竟幸運，只要能逃離集權專制，解脫普遍流行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架與價值判斷，創作自由其實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只看用不用。

再一輪的文藝復興是否可能？如果從二十世紀以來建立在現代性上的文藝史觀中抽身出來，把不斷的否定和挑釁與作秀丟進垃圾堆，重新觀審文學藝術的歷史，便不難發現，這一個多世紀並沒有導致新的文明，只不過繞了個怪圈，東方和西方如今不過掉換了方向，人類已經走過的老路現今東方和西方都重新再轉一遍，現實世界還就這麼荒謬。

把美學的顛覆與時尚的炒作丟到一邊，文藝復興也就順理成章。擺脫淺近的現實功利，文藝既不是武器，也不是工具，更不是商品，回到文學藝術的初衷，回到對人自身的觀審，回到人性與人情，回到審美，卻並非一番空想。只要作家藝術家有清醒的認識，便可以掌控自己的創作。

這樣的文藝復興當然不由民族國家來宣導，那只能導致文藝創作納入政權的管轄下，弄成某種民族主義的官方文牘，前有蘇聯標榜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後有毛澤東所謂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現今也不乏各種各樣的民族和地域的認同，用政治話語令文學藝術創作就範於現今的政黨政治和選票政治。

這樣的文藝復興只能出於作家藝術家個人的認知，不必由官方機關制定的文化政策加以創導和打造。恰恰相反，需要的是社會的寬鬆與寬容。而官辦的文化機構不如下放民間，盡可能多元和多樣化。

這樣的文藝復興固然需要各種各樣不牟利的文化基金的贊助，卻首先仍然取決於作家藝術家的覺醒，發出呼籲，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在文化圈中成為風氣，從而推波助瀾，才可能造成社會的某種共識。因而，公然提出問題，引發討論，十分必要。

這樣的文藝復興現今這時代並不囿於某些特定的國家和地區，像十五、六世紀的義大利，或十八世紀的法國。全球化的今天，作家藝術家的處境大致相同。而現今世界的經濟危機和文化衰退的背後，恰恰在於思想的危機與精神的困乏。社會革命論和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諸如此類的意識形態都解救不了現今時代的困境，人類需要的是新思想，震聾發聵。而新思想何在？

這也正是現今呼喚文藝復興的根據，新鮮的思想顯然不能指望從事於政黨政治的行家，也不能指望在媒體上天天爆料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統計與民意測驗。而現今不僅是精神困乏同樣也是哲學貧困的時代，既然意義都已經顛覆與消解了，哲學的思辨往往淪落為語意解析的遊戲。

且不必預言人類的未來如何，何況這樣的烏托邦許諾，那剛過去的二十世紀噩夢一般的現實人們尚記憶猶新，還不如回到此刻當下人的真實處境。老人道主義設想的那身心健全的人不過是一個理念，而與生俱來的人權與自由從來也未無償的賜予。然而，這脆弱的活生生的個人卻總也處於現實的生存困境之中，人類社會卻不知究竟往何處去。哲學的思辨解決不了這現實的困境，人所以訴諸文學與藝術正為了確認這令人困惑的存在。

哲學、宗教和文學藝術是人以不同的方式對自身生存的一番認知。當哲學訴諸思辨，宗教導致信仰，文學藝術卻通過審美而回饋為對人自身的確認。這宗教式微的時代，物欲橫流。意識形態同政治權力不斷調情，弄得原本清淨的哲學處境也十分難堪。而文學與藝術在政治與市場雙重擠壓

下，往往喪失了原本具有的審美判斷，以政治正確來附庸權力，以文化消費來投合市場。文藝復興的呼喚恰恰要回歸審美，回到人性與人的情感，回到生命，回到人的本真，回到性靈，回到精神。

這樣的文藝復興正取決於作家藝術家的良知與覺悟，當然不限於國家和地域，也不為表述的語種和形式所局限，當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只要作家藝術家有這樣清醒的認識，自然會去找尋呈現的方式。

這樣的文藝復興之所以可能，如同歷史上已經有過的陰暗的時代，卻仍然衝破了時代的暗啞，發出明亮的聲音和光彩。既然有先人的參照，今人又何嘗不能？

這樣的文藝復興當然首先來至作家藝術家深刻的認知，才能和功力也完全取決於作家藝術家個人，解脫政治的功利，超越時尚的趣味，以其真知灼見，達到傑出的審美呈現。

這樣的文藝復興令作家藝術家得大自在，在權力和金錢達不到的領域，精神飛揚。創作的這番過程便令人心悅，也才可能不計成果，持續不已。

這樣的文藝復興可以就在當下，一步一個腳印，步步登高，得以建構。這過程也沒有終點，心比天高。

這樣的文藝復興其實又心心相印，建構之時，隨時都在同前人先哲對話，而且無需經過後人的解讀或詮釋，直抵境界。

這樣的文藝復興既然建立在人性相通的大前提下，自然會喚起他人共鳴，得到回應，卻杜絕空話，無需嘩眾取寵，直指人心。

這樣的文藝復興就始於作家藝術家手下，一旦覺醒到有其必要，便不可抑止，一發而不可收拾，長期以往，功力與技藝也就相繼而來，渾然而天成。

這樣的文藝復興可不是不是不可能的。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修訂，巴黎

(本文收集在聯經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自由與文學》一書中)